常州学府与地方文脉传承

苏　慎

府学、县学、书院是我国古代教人习学仪礼、教书育人、培养人材、尊经藏书、传承国学、组织召集考试的行政机构和学府。历史上常州一直是州府所在地，其地风气儒雅，人才辈出，文脉常在。

一、府学——常州古代的最高学府

常州府学作为常州府官办学校，其规模、建制、生源比县学强得多，他是常州的最高学府，是常州遵经藏书之地，是本府生员参加各级考试的组织机构。

隋唐时期，随着封建社会的稳定发展，国家对地方上的教育事业也更加重视。从隋文帝开始，就命令各郡县建立学校，以教人习学礼仪。到了唐代初年，更对地方上府学的规模作出明确的规定：四万户以上的上郡，置学生 60 人；三万户以上的中郡置学生 50 人；三万户以下的下郡置学生 40 人。当然，对县学也有着相应的规定。这样，府学和县学，就成为我国古代地方上官家办学的基本方式。

历经唐、宋、元、明、清五个朝代，历时 1 300 多年的常州府学，在常州教育发展史上就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常州府学创建于唐肃宗至德年间（756–762 年），当时李栖筠来常州做刺史。李栖筠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被称为有“王佐才”、“魁然有宰相之望”（欧阳修《新唐书》）。却因遭忌被贬，来到常州。在治

理好一方的同时，他没有忘记自己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文化使命，在其任内，亲自操持创办了常州最早的学校——“常州州学”（北宋时更名为“常州府学”），校址选在常州夫子庙（又称孔庙）西侧。唐大历年间，学校又经扩建，其时府学所在林木苍郁，舍宇座座，子城河、玉带河环绕于其侧，校园里一片书声琅琅，校园旁流水潺潺不息。从此，常州的教育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因此，常州人永远不会忘记，赵州人李栖筠对常州教育事业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之后，虽然由于朝代的更迭和战乱等原因，常州府学历经毁损，但总是屡毁屡建，使这块读书地在常州这方沃土上始终得以保留，使这里散发出的书香不但渐次弥漫全城，而且飘洒到了全国。宋代著名散文家王安国（王安石之弟）在其所作的《（常州府）州学记》中，就曾盛赞常州府学为“东南绝伟之观”。而当宋大观三年（1109 年），宋徽宗集天下贡士会试于汴京时，独常州一地得中进士达 53 人之多，一时名震海内外。此次科考常州能在全国一枝独秀，当然绝非偶然，这与常州历任刺史、郡守重视教育、着力兴办府学是密切不可分的。为了纪念常州的这份光荣，郡守徐中特在府学状元桥的东边立起一座“进贤”坊，旁边又建一“荣赐”亭。

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清政府下令废除科举，兴办学堂。至此，在常州教育史上存在了 1 000 余年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常州府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然而，这一方常州教育的办学圣地却一直延续至今。如今，以古色古香的面貌呈现在府学旧址上的，是历史悠久、成绩卓著的常州市第二中学。

常州的府学作为官办学校，其规模、建制、生源等各方面的条件，无疑要比本地的其他各类学校要强得多，它是本地的最高学

府。因此，它对常州教育所起的作用和功能也是其他学校所无法比拟的。概括起来，府学在常州的教育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主要有两个方面。

第一，引领教育，开倡风气。在唐代常州刺史李栖筠创办府学时，它就在常州教育史上起到了首开官府重教风气的良好作用。其后，当时常州府所辖各县县学便皆以府学为楷模积极办学，武进县学更直接隶属于府学。且开初阶段，县学校址就设在府学内。南宋咸淳元年，武进县学虽择址另行办学，然而到了元代还只设“教谕一人附属于府学”，接受府学的工作安排和业务指导。另外，各县县学只能招收本县学子，而府学就能择优招收所属一府八县的优秀生员。如家在武进戴溪桥的赵翼就在 1745 年考中了府学的秀才，宜兴人余中也在常州府学求过学，后来考中了状元。当时，常州府管理教育的官员要开会商议地方上有关办学、科考、文庙祭祀等事项时，也总是安排在常州府学内举行。

第二，教书育人，倡行教化。常州府学从创办起就承载着教书育人、倡行教化的重任。南宋宋理宗时，将理学家、教育家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颁行天下，要所有的学校将此作为办学的共同学规。《白鹿洞书院揭示》不仅说明了教与学的目的，而且指出教学的内容和方向，以及自我修养的途径和方法，是一个相对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在这一理论体系的指导下，常州府学形成了自己严谨的教学传统，既重视教学内容的研习，更重视修身养性，强调如何做人。常州府学的教学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强调“学、问、思、辩”的学习方法，府学学生毕业时，不少人拥有广博的知识，能写一手漂亮的文章。后在封建科考制度的影响下，到明、清时代，府学逐步

以制艺和科考为主，学习诗赋时文和八股文。尽管如此，府学还是为常州培养了不少经世致用的人才，如名垂史册的唐荆川、赵翼、洪亮吉等，他们都曾经是府学时期的生员。

二、县学——文脉的传承

在今常州工人文化宫西首，有一组单檐歇山式、气势不凡的古建筑，这就是武进、阳湖县学旧址。县学的始建年代，据《常州市志》称，是在唐代，但目前尚未有具体的文献资料可证。现根据宋咸淳《毗陵志》关于县学“旧附于郡”的记载，肯定不会是晚于宋代就创建。

武进县学成立之初，因为府、县同城，故“旧附于郡”，隶属于常州州学。这一时期，县学与州学相比，除了学生数量有所差异外，在教师的配备和教学内容上基本相同，教师有博士和助教，掌管具体的教学。府学的博士由国家的吏部任命，县学的博士和助教由州一级任命。府、县学的博士都有着八品以上的官位。

据咸淳《毗陵志》载：南宋咸淳元年（1265 年），常州太守家铉翁应武进县广大学子的请求，将武进县学搬到了左厢崇文坊的法济寺（现工人文化宫）单独办学，撤掉原寺庙的佛像，重塑先圣、先师、十哲的像，并绘从祀于两庑。设一讲堂，称为尊经堂；又列四个书斋，分别以“博文”、“辅仁”、“升俊”、“复礼”为斋名。县学设教谕一人，以寺租为学粮。自此，武进县学学址确定于此，历 700 余年未有变动。

元代，蒙古族统治者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秩序，朝廷规定各级各类学校大力继续宣讲儒学的伦理规范，重视学人的道德发展趋向。武进县学也积极阐扬这一原则，学生不但对古典经义耳熟能详，而且都十分注意自身的道德修养。其时，常州已升为路，常州路

儒学提举司还分别向路(州)学、县学派驻提举学校官,以便加强对官办学署的管理。提举学校官的级别、待遇为“正九品,月俸钞一锭一十两”。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建立明朝,为推行中央集权制,“一宗朱子之学”,非孔孟之书不读,非程朱之理学不讲,国子监乃至地方儒学便都极力尊奉程朱之学,力推性理精义,并大规模整修学署和文庙。当时,驻守常州的大将为明太祖朱元璋的心腹、开国功臣汤和。汤和认真负责地执行了朱元璋的文教政策。根据现保存完好的明洪武七年(1374年)《常州府武进县儒学记》可以得知,武进县学在洪武七年进行了大规模重建,当时的主要建筑有:棂星门、泮池、明伦堂、礼圣殿、尊经阁、东西斋房、楼房、后堂、射圃亭、碑亭等数十处,屋宇连片,规模宏大,建筑精美。

清康熙年间,县学每年各收廪膳生、增广生20名,附学生(计划外所招)则无定额。生员最多时达500余人,少时亦不下300人。可见县学的规模之大和常州地区的学风之盛。清雍正四年(1726年),由于常州府税赋繁重,为方便管理,遂将所辖五县中的宜兴、无锡、武进三县一分为二,另设立荆溪、金匮、阳湖三县。由于县学设立于阳湖县境内,而武进不单独设立县学,故武进、阳湖两县便合并办学,共同出资管理,武进县学同时更名为“武进阳湖县学”。

武进阳湖县学在清代屡毁而屡建。清道光十七年(1837年)武进知县吴时行、阳湖知县范凤谐共同重建。咸丰十年(1860年)因毁于太平天国战火,同治六年(1867年)再次重建,并在县学内设立吴季子祠、商子祠、张子祠、唐荆川祠、县学文昌祠、县学乡贤祠、医学三皇祠。县学成为明、清尊孔、尊儒以及宣扬封建道德礼教的重要

场所。

每年农历三月，知县在县学内主持县试。考试前一个月，县衙贴出告示，确定考试日期，应试童生向县署礼房报告，填写报名表。考试共分五场：第一场正声，第二场初复，第三场再复，第四、五场为连复。每场考试为一天，黎明前点名入考场，限当日交卷，内容为“四书”、“五经”，试贴诗，或默写《圣谕广训》等。县学成为古代士子求取功名、步入官场的起点。

明清两代，常武地区共出进士 728 人，居江苏省第二位，在全国 48 个出进士最多的城市中位居第九。显然，这是与常武地区重视教育、官学兴盛分不开的。

同时，武进阳湖县学为常州府学输送了大量优秀生源，为本地培养了众多俊才，其中的佼佼者主要有：陈祖仁（1314–1368）元代至元二年状元；唐荆川（1507–1560）明代散文家、书法家、抗倭名将；孙慎行（1565–1636）明代东林党人、书法家；杨廷鉴（明末清初）明崇祯十六年状元；赵熊诏（1663–1721）清康熙四十八年状元；庄存与（1719–1788）清代今文经学派创始人；黄仲则（1749–1783）清代布衣诗人；洪亮吉（1746–1809）清代著名学者；赵翼（1727–1814）清代史学家、诗人；吴稚晖（1865–1953）中国近代政治家、文化名人、书法家；吕思勉（1884–1957）著名历史学家。

风雨沧桑，岁月流逝，武进阳湖县学作为常州重要历史文化遗存被保护了下来。如今，县学旧址尚在，其西侧的一条县学街也一直叫到现在，它是常州地区悠久历史的见证。县学，作为传承常州地区文脉的重要载体，常州地区重教兴文的又一实证，正吸引着众多关心地方文化的人士寻访和探究的兴趣。

三、书院——讲学和藏书的场所

在常州史载的22所古代书院中最负盛名的，当属道南书院、延陵书院和龙城书院。

道南书院的前身即常州最早创建的城东书屋，其创立时间可追溯到北宋崇宁年间(1102–1106)。书院创建之初,由创办人常州理学名儒周恭先亲自主讲,后因从学者日众,原学舍狭小而难以容纳,乃另建城西书屋,由周恭先及其弟周孚先分讲其间。北宋末年,大儒杨时被聘来书屋主讲。当时杨时就居住在城西书屋,因此城西书屋又名“龟山书屋”。这里作为杨时在常州讲学的立足点,为杨时传播学术思想、培养学术人才扩大了影响。当时,杨时在常州的讲学之地遍布常州东南各乡,甚至到达常州与苏州两府的交界处。在中国思想和学术史上有着十分重要地位的无锡“东林书院”即是杨时取自己游庐山时所作《东林道上闲步》的诗篇而得名。

道南书院作为讲学场所,得其名师杨时的影响,一时成为全国重要的学术中心。这样,这座书院既奠定了它在常州书院中的学术地位,也提升了常州书院的整体办学品位。在常州众多的书院中,办学历史在500年以上者,仅道南书院一家,其影响之深远由此可见。

延陵书院是清康熙七年(1668年)年由知府骆钟麟创办,始延聘“三大儒”之一的陕西西安人李禺页主讲。“先生之教,因人而施。”凡有答问,“穹昼夜不倦,必使其人豁然于心目之间而后已。”同时,他还应邀至常州府属之无锡、江阴、宜兴、靖江等地讲学,听者云集,极一时之盛。《延陵书院记》还载:“太守(骆钟麟)与郡邑大夫士讲学其中,未几,太守以忧去,而新太守纪公尧典复振兴其事,讲习如旧。”道光十八年(1838年)知府黄冕重建延陵书院,其时有

常州人汤成烈，道光十一年举人，官浙江玉环同知后辞官归里，主讲延陵书院达 10 余年。清康熙年间，著名学者陆世仪主讲延陵书院时，他把讲学与指导学生读书结合起来，提出分年、分等、分类的学习指导意见。所谓分年，是不同年龄学生的学习分期：5 至 15 岁为诵读期，15 至 25 岁为讲贯期，25 至 30 岁为涉猎期；所谓分等、分类，是把生徒应读的书分最重要、次要、更次三等。“四书”、“五经”、“性理”等儒家经典为第一类，最重要，当终身诵读；水利、农田、天文、兵法等为第二类，次要，也须一一研究，求其要义；子、史、百家等书为第三类，又次要，观其大意其可。这样指导读书，显然是很有见地的。所以说，书院一方面对儒家思想的传播，文化事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为常州地方上培养了许多有真才实学的经世人才。

龙城书院是常州最大、最著名的书院。明隆庆六年（1572 年），常州知府施观民选址武进县子城厢二图局前街，建龙城书院。著名学者柳诒征在《江苏书院志初稿》中称：“常州之书院，曰龙城，曰延陵，而龙城为最著。”这不单在于其规模大（堂斋 200 余间）和办学经费之多（有膳田 1 157 亩），更由于“以卢文弨尝掌教，其门下多通才”。

明万历初，张居正出任首辅，下令“尽毁天下书院”。但是，由于书院讲学制度的形成有其深厚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又有广泛的社会需要，所以在万历三十一年（1603 年），常州知府欧阳东凤顺乎民心，将被百姓占用的龙城书院的房地产赎回，用以改建“先贤祠”，进而恢复讲学，只是“避书院之名”而已。时“先贤祠”作为讲学之地，由侍御钱一本掌教。当时，邻郡学识渊博、掌教有方之士，也常来相聚论学。例如，无锡东林书院的泾阳、景逸、闲适三先生，还

有宜兴明道书院的玉池先生，常与龙城书院诸先生“往来酬答，商榷辩难”，人称之为“蔚然为东西邹鲁”。

谁知张居正“尽毁天下书院”的命令尚未“解禁”，宦官魏忠贤又于明天启年间（1621—1627），悍然下令禁办书院。时常州知府曾樱，多次上表朝廷，坚称龙城书院系课文之所，“非讲学之地”，故幸而未毁。据《常郡艺文志》载，时知府甚重讲学，“每月有会，公必亲临。以圣贤之学相切，往往至日昃不暇为文而诸生神怡心悟。”因此，这一时期竟是龙城书院讲学最兴盛的时期，不仅本地学子乐于听讲，就连福建、浙江、江西等地的学子，也不远千里来到龙城书院问学。

清代中期，政府在文教政策上采用专制与怀柔相结合的手段，逐渐改变过去对书院的态度，变消极防范为正面鼓励，进而明令“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这样，原已明令停办的书院又得以复办。乾隆十九年（1745 年），常州知府宋楚望上任后，即在常州府“明伦堂”召见地方士绅，慨然表示“以兴复书院为己任”。资金不足，便取消“象墩庵”，将 940 余亩僧田悉数划归书院，还慨然以自己的俸禄捐助。在修建龙城书院的过程中，宋楚望亲临现场指挥，仅两个月，就完成修建工程，首为龙城书院的大门，下依次为大堂、讲堂、寝室，左右各有斋室 20 楹。此时，龙城书院先后由著名学者邵齐焘、卢文弨为掌教。邵齐焘主讲于龙城书院时，洪亮吉、黄景仁俱曾在龙城书院就读。老师慧眼识英才，晨昏留课，饭后独授，恨不得把自己的知识一下子全部传授给学生。学生也深爱老师，洪亮吉、黄景仁于老师逝世后，写了好多首诗词，抒发自己对老师那刻骨铭心的感念。“后

死亦知终未免，愿分抔土作比邻。”字里行间，洋溢着师生间那种生死相依的情感。

在清朝末年废科举、兴学堂的浪潮中，1902 年，龙城书院改为“武阳公立小学堂”，后又更名为“武阳公立高等小学校”和“武进县立高等小学校”。1950 年，校名改称“常州市局前街小学”并一直沿用至今。从此，学校也展开了一个全新的篇章。

（本稿由常州市社科联推荐）

苏慎，1947 年 2 月生，常州武进人，大学文化。现为中国姓氏文化研究会理事、常州市姓氏文化研究会会长、常州市国际友好协会副会长、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常州市长三角经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

热衷于地方文献的收集和研究，特别是宗谱收藏和姓氏文化研究。出版或刊印的书刊有《常州姓氏》、《兰陵萧氏源流考》、《苏轼常州情缘》、《苏东坡与常州》、《姓氏文化》等，发表姓氏文化研究文章百余篇，参与或协助 60 余个姓氏的宗谱资料整理和纂修，为海内外多个姓氏寻根问祖提供了可靠的谱牒资料。多批回常州寻根祭祖的海外代表团都愿为祖籍地经济文化建设贡献力量。